

罗湘民 主编

松竹梅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华文出版社

松 竹 梅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罗湘民 主编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郭未礪

封面设计:周杰

松 竹 集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罗湘民 主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2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5075-0392-5/Z·71 定价: 7.00元

前 言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一种崇高的深厚的思想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道德标准、重要的政治原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维护团结的强大凝聚力。

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外，有的曾被外国灭亡，有的长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有的在一度光辉后从世界国家名册中消失。唯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延绵不断，中华民族在不断融合中繁衍壮大。帝国主义虽曾多次想以武力征服她，但始终不能得逞。在悠悠岁月中，中国虽历经内忧外患，几度分裂，但分裂毕竟是短暂的，而统一占了主导地位。是什么力量使我们祖国保持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和文明的连绵？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当我们谈论中华民族时，不能不谈及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当我们回首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时，不应忘记繁星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对长期在这片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人民，对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尽其自己最大的可能去爱她，保护她，装点她。这些知识分子，在执柄朝政、为

官一方时，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团结，造福于民；在国难当头时，或投笔从戎，驰骋疆场，或奔走呼号，唤醒国人，或毁家纾难，支持抗战；在豺狼当道、邪恶横行时，或矢志不渝，洁身自重，或切谏庭争，宁折不弯。每当我们谈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壮诗句时，每当我们想起谭嗣同为使中国有复兴之望，甘愿以自己的热血去警醒国人，陈天华以蹈海一死来激励后人救亡图存的悲壮行动时，谁不为之动容！谁不为之肃然起敬！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英，是支撑一个有世界上最多人口、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厦的脊梁。

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民族赖以生存、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也是当今凝聚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这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地继承它，切实地发扬光大它。这不仅关系着中华的振兴，也关系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书。但由于水平有限，其中不妥之处会有不少，敬希读者指正。

编 者

1994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我国爱国主义传统
形成的历史渊源.....(1)
2. 爱国主义与中国的知识分子.....(18)
3. 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36)
4. 睁眼看世界 师夷之长技.....(46)
5. 为中华之崛起 觅救国之良策.....(67)
6. 历尽苦难 痴心不改.....(89)
7.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107)
8. 铮铮铁骨 反抗暴政.....(125)
9. 折冲樽俎 不辱使命.....(148)
10. 饱含爱国激情 讴歌祖国
大好河山.....(167)
11. 不畏艰险 攀登科技高峰.....(186)
12. 愿做光明烛 照亮后来人.....(203)
13. 无私奉献 雪“东亚病夫”之耻.....(227)
14. 游子丹心 报效祖国.....(241)

1. 我国爱国主义传统 形成的历史渊源

陈 彤

一部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世界各国的兴衰史。那些曾雄踞世界文明高峰，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明古国，有的已悲壮而无奈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有的虽还存在，但其版图和对世界的影响，已今非昔比，只有那颓垣断壁的古建筑、残破锈蚀的金属物，还能勾起人们对它们昔日峥嵘岁月的思古幽情；有的曾沦为殖民地，历史一度中断。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一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虽然，在她的数千年历史中，历经战乱，几度分裂，但总的来说还是保持着统一的。1840年后，虎视眈眈的外国侵略者，妄想把她变为它们的殖民地、附属国，然而中华民族始终是不屈的，侵略者落得了可耻的下场。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应该说是受益于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本文试就我国爱国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渊源作一点探讨。

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扎根 于中华民族形成史中

如果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算起，五十万年前，

中华民族就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远古时代，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地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住在东方的，被统称为“夷族”；住在北方和西方的，被称为“狄族”和“戎族”；住在南方的，统称为“蛮族”。当时，属西戎羌族一支的炎帝族，自西方游牧进入中部，与最早进入中原的属于“蛮族”的九黎族，发生了长期的部落冲突。结果，九黎族首领蚩尤被杀，部落中的一部分退回南方，另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徙无常游牧生活的黄帝族，又与炎帝族在阪泉（据说，即是现在的河北怀来）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战胜了炎帝族，逐渐在黄河中游两岸地区定居下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所称之“华族”，并成为汉代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同时，也开始孕育和发展着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中国”这一名称的由来，就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代表着传统文化的所在地。

传说，黄帝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黄帝妻子嫫祖养蚕，仓颉造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这些传说虽多出于战国、秦汉时期学者的附会，但有一点可以理解、可以说明的是，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承认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中国人则自称为“炎黄子孙”。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被东方六国称为西戎的秦国，不断向中原各国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输入大量人才，实行富国强兵的变革。赵国的武灵王为了对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作战，放弃了华夏族传统的车战，改用“胡服骑射”，向北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使国力大增。这些都为秦始皇统一中原

准备了条件。秦汉时期，在前代民族融合的基础上，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原来的华夏族——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干。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和西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与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学会了农耕，服饰、语言、习俗也渐渐汉化，有的最后完全融入了汉族。与此同时，不少汉族人为了躲避战乱，不断向南迁移，并把先进的生产工具、经验以及文化带过去，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地区日渐繁荣。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唐朝末年。唐朝初年，唐太宗对边疆各少数民族采取了和亲和彼此通商、友好往来的政策，关系日渐密切。当时的国都长安常有藏、回纥、百蛮等西域各族人往来，他们有的是地方政府派驻的常设代表，有的是邻邦派来的友好使者，还有许多商人、艺人及宗教人士。敦煌艺术宝库中，许多唐代的绘画和人物彩塑就取材于当时少数民族。五代十国期间，民族融合又有规模不等的几次发展。在元朝的蒙古族和清朝的满族执政期间，分别设置了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加强了中央对各民族地区的领导，为我国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这三次民族大融合，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巨大进展，中国的疆域也不断地得到巩固，并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现在的版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其它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像汉唐这样的大帝国，比如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但后来它们一个个都土崩瓦解了，而泱泱中华却

始终不曾解体。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所建立的国家是依靠武力征服而建成的军事共同体，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一旦军事控制削弱，就立刻土崩瓦解。

斯大林给民族下了这样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还强调：“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①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中华民族这四个特征的形成过程。

由于古代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录音设备，因此，共同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较难考证。但从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来看，这个共同语言的形成过程却是非常清晰的。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即使从已有体系可寻的商代甲骨文算起，至今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种虽象形、又会意的文字，尽管“图画性”还比较强，并且尚未定型，但其中许多字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的雏形。从商代开始，在青铜器物上铸上文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文，或称钟鼎文、铜器铭文。西周时，金文盛行。西周金文，从总体上说，较之商代的甲骨文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甲骨文中那种“依类象形”的符号化减少。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严重混乱状态。^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令李斯统一规范、整顿文字工作。李斯在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② 许慎：《说文序》。

战国时期出现的史籀大篆基础上，加以省略、改造，“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创造了一种叫“小篆”的字体，经秦始皇核准颁布，定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文字，即“书同文”。至汉朝，“学僮十七已上始试……书或不正，辄举劾之”。^①这说明自秦汉起，用以表达语言的字体全国完全一致，更不用说语法结构，表达方式了。当然，我们这里所谈的“共同语言”的形成，是指官方语言的“共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发展程度很不平衡，不但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一些较先进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就是同为汉族的不同地区的人，在语音上差别也很大；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只是限于本民族内使用。中国的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他们虽有自己的蒙文、满文，并且在政治上对汉族实行歧视的政策，但在官方语言、文字上，都不能不采用汉文汉语，并逐渐被汉文化所同化。在汉人居住的不同地区，虽语音各异，但写在纸上的字却是相同的，即人们常说的“字同音不同”。

在数千年中，中国各代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域虽然大小不同，但都是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轴心，时而增大，时而缩小。到秦汉时代，“共同地域”就基本形成。到清朝，我国的版图就基本定型。凡是生活于这个版图上的华夏族人，都自然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中国整体而言，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农业收成的好坏，不独关系着人民

① 许慎：《说文序》。

生活，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巩固。因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帝王都把“以农为本”作为基本的政策。西汉政治家晁错在上汉文帝的《论贵粟疏》中指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廩，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或旱或涝，都会影响农业。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态下，为了防止“左隄（北岸）强则右隄伤，左右俱强即下方（下游）伤”的各自为政、损人利己情况的出现，尤需统一管理水利，这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大禹、李冰、西门豹等人因为治理水灾、兴修水利有功，受到人们历久不衰的赞誉和怀念。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族经济文化的根据地的黄河流域，黄河既给农业以灌溉之利，但也经常造成洪水之害。因此，春秋时齐桓公葵丘之会，各诸侯共同订立的“五禁”中，其中之一便是“无曲防”。^①其大意是禁止各国从局部利益出发，构筑堤防以障遏水流，使邻国受水旱之灾。战国时有个叫白圭的人，自认为他的治水方法比大禹强。孟子对他说：“你说的不对。大禹治水是按照水的自然流向去治理，以四海为壑，而你治水是以邻国为壑，逆着自然流向，结果造成洪水灾害，有良心的人都反对你的这种做法。”^②这两个例子说明，由于农业上灌溉和排水的需要，“所

①② 《孟子·告子下》。

以就更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①这种经济上的要求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人民要求统一、团结，反对、厌恶分裂和内乱。秦始皇为统一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他废分封，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消灭了诸侯割据的政治基础。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修驰道，车同轨，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秦始皇还北征匈奴，南征百越，统一岭南，加速了这些地区的民族融合，不断扩大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的各族人民，从此被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任何分裂势力再也拆不散、摧不垮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形成了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

从经济的联系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孔子就曾谈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②足见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为便利交通而设置驿站的制度。据《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所记，长江、黄河、淮水在那时已经通航，南北各大水流都可通舟楫，商人用舟车运载货物往来各地，不受什么阻碍。司马迁对此描述说：“夫山西饶材、竹、穀、纻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② 《孟子·公孙丑上》。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①春秋时的周、郑、齐、晋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其繁华景象。荀子在《王制篇》中描述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紵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这说明，当时不仅有国内的贸易，而且与周边国家也有交换。到汉朝，中国国内大小市场已形成。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大市场。张衡的《西京赋》是这样描写长安的市场规模和景象的：“廓开九市，通阡带阡，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以这些大城市为圆心，以不同的半径与全国各郡县的中小城市发生联系，使全国各地的经济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这种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经济联系，并与坚强有力的共同文字等相结合，就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凝聚的强大力量。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必然地形成“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出现了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空前文化繁荣。产生出像齐桓公、晋文公、管仲、子产等著名的政治家，孙武等著名的军事家，还有孔子、墨

① 《史记·货殖列传》。

子等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特别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起着奠基者的作用。他不愧为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其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成为华夏文化的主体。他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有益格言，对培养中华民族的为社会、为国家作奉献的人生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文天祥在临死前的腰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明末著名抗清将领、民族英雄张煌言，在1664年9月7日临刑前的绝命诗中说：“我年适五九（时年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经过战争和文化、经济的交流，住在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民族进一步得到融合，华夏文化得到一致的认同。到战国时期，北起秦、赵、燕三国所筑的长城，南至闽、越海滨，在这样有二千万人口的广大区域内，大体上只存在着单一的华夏文化。文化的共同，造就了心理状态的共同。所以很早中国人就说“四海之内若一家”。

汉初总结秦亡教训，倡导自然无为的黄老之学，废除秦之苛法，减轻赋税，使长期战乱之后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例如曹参继萧何为丞相，“日夜饮醇酒”，“不治事”，为政“清静”，百姓安宁。中央政府的清静无为，却引起一些地方的王侯觊觎中央政权。一些有识之士便劝皇帝警惕，采取措施，制止一些王侯的不轨活动，但当时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总下不

了决心。直到吴楚七国之乱，才使他们恍然大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发挥了《春秋》关于“大一统”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由春秋、战国时的“显学”之一，正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产生了一个中心的一元观念，全国人的思想都趋向的政治中心。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①即是说做人君的要身正心正，以身作则，否则会对社会起到坏影响，甚至造成不幸，即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的思维、政治和文化生活。应该说，“大一统”的思想是适应中央集权的，所以它才能长久地保存、发展，并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但是，它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使全国人的思想有一种趋同性，趋同于儒家，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于这种趋同心理，故中国在历史上虽曾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混乱，以及宋、辽、金、元的纷争，但中华民族却没有瓦解，并基本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即使处于暂时分裂的时期，各政治集团仍都以统一作为自己的

① 《春秋繁露·立元神》。

最高使命，而广大人民对分裂更是深恶痛绝，所以在每次短暂分裂之后，都出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统一。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大一统影响下有一种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国家统一的时候，起着维护统一，防止分裂的作用；在国家分裂的时候，起着促进统一、结束分裂的强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二千多年来能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一统的思想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历史也一再地证明：任何封建国家，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战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有安定的政治形势，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经济，才能有自己的独立。

因此，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来看，从我们民族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来看，我们的爱国主义传统，尤其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深深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历史之中的。正如胡耀邦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华各民族从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的爱国传统。历史上的国家分裂，从来只是暂时的，从来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总是复归于统一。”^①

灿烂的文化，多娇的江山 孕育了民族自豪感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高昂激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著称于世。这种自

^① 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